

当前国际政治与社会主义发展

北京市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学会 编

世界知识出版社

北京市社会科学理论著作出版基金资助

当前国际政治与 社会主义发展

北京市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学会 编

世界知识出版社

责任编辑:王 江 陈来胜

责任出版:夏凤仙

装帧设计:麟生工作室

责任校对:何 莉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当前国际政治与社会主义发展/北京市国际共产主义
运动史学会编. —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 2002. 11

ISBN 7-5012-1898-6

I. 当... II. 北... III. ①国际政治-研究-
学术会议-文集②社会主义-研究-学术会议-文集

IV. D033.4-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85182 号

当前国际政治与社会主义发展

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东城区干面胡同 51 号 邮编:100010)

网址: <http://www.wapbook.com>

北京力托科技有限公司排版 北京朝阳展望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850×1168 1/32 印张:15% 字数:375000

2002 年 11 月第一版 2002 年 11 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1000 册

ISBN 7-5012-1898-6/D·362 定价:32.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编者前言

我们正处在一个大变革的时代。关注现实、关注社会、大胆创新是理论工作者的使命和责任。为了推动北京市社会科学的繁荣发展,北京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决定自 2001 年始每年举办一次大型系列学术活动——学术前沿论坛。论坛由市社科联牵头组织,各分会具体筹划。论坛主题集中在各个领域当年所关注和研究的前沿和热点问题,邀请各自领域的专家学者进行集中研讨。各分会还要围绕自己的研讨主题征集论文,并从中选择一批优秀论文结集出版。

经过精心筹划和认真组织,首届学术前沿论坛于 2001 年底在国家图书馆举行。为配合首届学术前沿论坛大型系列活动,加强对本学科领域热点及前沿问题的探讨与研究,北京市国际共运史学会举办了主题为“当前国际政治与社会主义发展”的学术研讨会。来自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共中央党校、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编译局等十余家单位的四十多位专家学者出席了研讨会。会议的主要议题包括:关于当前国际政治态势问题;关于时代与当代资本主义发展的新阶段问题;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现状与前景问题;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史上若干重大史实的再评价问题,等等。

理论研讨会的征文活动从 2001 年 3 月初开始到 11 月未结束,共收集论文 97 篇。经过评选,有 39 篇论文汇入这篇文集。

KAF29/04

另有一篇研讨会的综述附后。

在筹备会议和论文征集过程中,我们得到了北京市社科联、北京市共运史学会以及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共中央党校、中央编译局、北京师范大学等单位的鼎力支持,得到了世界知识出版社的热情帮助,在此一并表示诚挚的谢意。

需要说明的是,本书所收论文观点是作者个人观点,而且所收论文涉及内容非常广泛,由于作者的知识背景、观察视角、研究方法各有不同,每篇论文都独具风格,很难形成一个整体,我们只能根据论文所讨论的问题粗线条地大致划分成几个板块。另外,限于篇幅,我们对个别较长的文章在不伤及文章观点及结构的情况下进行了少量删减,敬请作者谅解。由于编者能力与编辑水平有限,不足之处在所难免,也请广大读者和学界同仁批评指正。

北京市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学会

2002年2月

目 录

1	认真总结历史教训,促进国际共运健康发展	李景治
16	世界政治中的秩序、制度与治理	张胜军
31	对世界多极化在曲折中发展的理解	张发岭 吴 新
40	世界多极化曲折发展的原因及未来趋势	王远美
55	对三个“不愿看到”和五个“渴望”的初步理解	朱燕丽
68	经济全球化与世界社会主义的前景	贾建芳
81	论冷战后国际关系中的意识形态问题	方书涛
91	当代国际政治中的人权斗争及中国的 国权观与人权观	邢爱芬
113	“上海合作组织”的“三新”理念为推动 建立国际关系新秩序树立了典范	吴建新
126	社会创新和技术创新:两岸四地应对入世挑战 ...	张 军
142	美国退出《反导条约》对国际关系的影响	李 颖
152	当代资本主义的变化与矛盾	林德山
178	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关系的再认识	胡振良
196	对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发展及其 相互关系的若干看法	孔寒冰
210	如何对待马克思主义关系到共产党的兴衰	张中云
221	新形势新任务与“三个代表”思想	陈新明
233	论中国共产党的新型党际关系思想	王建新

246	党的绝对领导是我国最高军事 领导制度的核心	曹光明
256	论参政党与民主监督	张小平
264	俄罗斯共产党在困难的道路上前进	王正泉
275	普京执政后的俄罗斯联邦共产党	田 越
294	转型时期的越南执政党的建设	许宝友
309	老挝继续推进的革新开放事业	汪亭友
326	古巴对外关系的发展历程及其特点	任树瑛
336	欧洲社会民主党理论和实践的新调整	曹长盛
345	冷战后社会民主党理论政策调整的 内容及原因	杨晓华
354	法国社会党的欧洲政策	王明进
369	对 20 世纪中期中苏分裂原因的一点看法	梁利锋
379	苏东剧变的根本原因和社会主义的出路	韩云川
389	苏联共产党垮台的原因及教训	莫海兵
403	苏共指导思想的误区与苏联解体	赵志敏
418	腐败:苏共灭亡原因的再透视	光 炜
429	迷失方向的苏联新闻媒介	新 一
439	列宁去世后苏联领导层关于如何建设 社会主义的理论论争评析	蒲国良
458	对斯大林“一国建成论”的再思考	徐 恕
470	中东欧国家转轨以来引进外资情况的 分析与展望	许勤华
480	欧盟共同外交和防务政策的新进展	王海霞
487	2001 年北京市国际共运史学会年会暨“当前国际 政治与社会主义发展”学术研讨会综述	戈 春 马军亮

认真总结历史教训，促进 国际共运健康发展

李景治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既有成功的经验，又有失败的教训。经验和教训都是宝贵财富。总结教训也应像总结经验一样，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特别要注意克服片面性，不能只注意问题的一个方面而忽略其余。例如，总结苏东剧变的教训，既要看到帝国主义和平演变的因素，又要注意其内部原因；既要分析经济发展的不足，又要分析政治体制的缺陷；既要重视戈尔巴乔夫上台后推行“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的恶果，又要重视其中的历史复杂因素。当然，这不意味着不分主次、轻重。相反，我们在全面分析的基础上，还应抓住主要矛盾，找到问题的主要症结。我们应本着这样的原则总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教训。

一、必须防止和反对“左”、右两种错误思想倾向

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曾不止一次出现“左”或右的错误思潮。抵制、批判和斗争不够坚决有效，就会导致错误思潮泛滥，造成极其严重的后果，给各国革命事业和国际共产主

义运动带来极大的危害。马克思、恩格斯逝世后，德国社会民主党及其他第二国际党内的右倾思潮、改良主义逐渐蔓延，而党的领导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们对此重视不够、斗争不力，致使其在党内逐渐占上风，最后导致这些党和第二国际思想上、政治上的瓦解，一些党背离乃至反对、镇压革命，也使十月革命后的欧洲革命流于失败。在中国，右倾投降主义曾导致大革命的失败和大批共产党人流血牺牲。在苏联，戈尔巴乔夫全面推行“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路线，导致了苏共的解散、苏联的解体、社会主义制度的瓦解。

共产国际时期，特别是列宁逝世后，苏共曾犯“左”倾错误，党内斗争和肃反扩大化，造成大量冤假错案，使成千上万无辜者蒙受不白之冤，甚至惨遭杀戮。共产国际和各国共产党内的“左”倾错误也曾造成极大危害。当时推行的布尔什维克化曾使各国党内出现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局面，宗派主义、关门主义倾向严重，压制了不同意见，迫害了大量坚持正确观点的同志。在其影响下，中共内部连续出现“左”倾错误，排斥、打击和迫害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坚持正确路线的优秀共产党人。“左”倾领导人放弃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放弃农村革命根据地，调动红军进攻大城市，在城市冒险指挥武装暴动，致使土地革命遭到挫败，农村革命根据地丧失殆尽，红军损失大部，城市工作几乎陷入瘫痪状态。在1956年以后，新的“左”倾错误逐渐严重，从反右扩大化到1959年庐山会议，从阶级斗争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到“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重点整党内“走资派”，最终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大灾难。

在社会主义建设问题上，社会主义各国都在不同程度上犯了“左”倾错误。最突出的表现就是急躁冒进，超越社会主义发展阶段，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在苏联，30年代急于实现全盘集体化，赫鲁晓夫执政时期提出20年基本建成共产主义。

在中国则出现了 1958 年的大跃进，要“跑步进入共产主义”。这些都违背了经济发展规律，阻碍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影响了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乃至造成大饥荒。事实证明，无论“左”还是右的错误都有极大的危害，最终都会造成亡党亡国的极端后果。正如邓小平所说：“右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也可以葬送社会主义。”^①因此，总结历史的教训，既要反“左”，也要反右，二者都不可忽略、不可偏废。当然，各个历史时期和各国的具体情况不同，错误思想表现形式也有所不同，有时“左”的倾向明显，有时右的倾向突出，有时“左”和右的倾向复杂地交织在一起，从两个方面干扰正确路线的制定及其贯彻执行。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保证正确路线的制定和贯彻执行，必须有“左”反“左”，有右反右，乃至同时反对两种错误倾向。因此，2001 年 9 月 26 日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党的作风建设的决定》重申：“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必须克服各种错误思想倾向的干扰，坚持有‘左’反‘左’，有右反右。右主要是否定四项基本原则，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左’主要是思想僵化，把改革开放说成是引进和发展资本主义。在新的形势下，‘左’和右都会有新的表现。全党同志应保持清醒头脑，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②

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其根本任务和全党全国工作的重心是发展社会生产力。要发展生产力就必须在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前提下，自觉调整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各个方面和环节，把社会主义同市场经济结合起来，需要积极探索，大胆试验，深化改革，解决体制转变中的深层次矛盾和关键问题，需要扩大开放，吸收和借鉴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和经验。而迄今为止，这方面的干扰和阻力主要来自于“左”倾错误。有些人认为“和平演变的主要危险来自

经济”。苏东剧变使人们对帝国主义和平演变战略以及苏东奉行戈尔巴乔夫的民主社会主义导致资本主义复辟的教训已有比较清醒的认识，在这方面的警觉度比较高，广大人民群众从亲身感受中更加拥护社会主义。在这种情况下，以抛弃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为目的的右的错误思想受到了有力抵制。与此相反，“左”的错误思想却未受到有力抵制，致使一些人或明或暗地否定改革开放，他们“把改革开放说成是引进和发展资本主义”，从而影响了改革的深化和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因此，邓小平一针见血地指出，“现在，有右的东西影响我们，也有‘左’的东西影响我们，但根深蒂固的还是‘左’的东西”，“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

为什么“左”的影响根深蒂固，不易克服呢？这是由三方面的原因造成的。首先，从国际大环境来看，自共产国际时期以来，苏联和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在无产阶级革命、党的建设、社会主义建设等一系列问题上存在“左”的错误倾向，其消极影响巨大而深远，且长期没有得到批判和克服。其次，从我国的情况来看，除了新民主主义革命过程中的三次“左”倾错误，自1956年以后的几乎整个社会主义建设时期，都存在“左”的错误，而且越来越严重，直到“文化大革命”，再加上毛泽东本人的崇高威望，其影响短期内不可能得到克服。第三，从指导思想上看，长期以来，人们习惯于认为“左”是革命策略问题，而右则是立场、原则问题，是反革命，因此宁“左”勿右的观念一直困扰着某些人，今至仍有一定的市场。正如邓小平所分析的“‘左’带有革命的色彩，好像越‘左’越革命”。^③

“左”和右的错误表现形式虽不相同，但有一点是共同的，即都是思想和理论脱离实际。或超越社会主义的发展阶段，提出不切实际的计划、方针、战略和策略，或思想落后于现实、

理论严重滞后；或不顾现实生活的发展变化，僵化地固守某些过时的理论、原则，拿大帽子吓唬人，或不顾基本国情盲目照搬西方的东西。所以，无论是“左”还是右，都容易主观片面，走极端。因此，克服和防止“左”、右两种错误的根本办法，就是一切从实际出发，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

二、必须善于把理想和现实、人民群众的长远利益和近期切身利益有机结合起来

建成社会主义、实现共产主义和全人类的解放，这是共产党人的伟大理想和为之奋斗的最终目标，也是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长远的、根本利益所在。但伟大理想和宏伟目标的实现要经历一个很长的历史过程，经历几个大的和相当多小的发展阶段，这些阶段既相互联系，又存在差别。除非特殊情况，一般而言，这些阶段不能简单地任意超越。各个阶段的生产力发展水平、社会阶段状况、主要矛盾以及无产阶级处境和面临的主要任务都有所不同，广大人民群众具体的利益需求也不一样。长远利益是由无数切身利益组成的，离开近期切身利益，实现长远利益不过是一种幻想。人民群众往往从近期利益去理解长远利益。忽视其近期切身利益去追求长远利益，就必然会脱离群众，我们不能用共产党员、领导干部的标准要求普通百姓。共产党人不仅要树立崇高的共产主义理想、远大的解放全人类的目标，而且要制定不同的发展阶段、不同历史时期的具体战略、方针和政策。在制定和执行这些战略、方针和政策时，要善于把理想和现实、把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的长远利益和近期利益有机结合起来。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最大的失误和教训之一恰恰是没有很好地处理这两方面的关系，把二者有机结合起来，存在理想脱离现实、只考虑长远利益而忽略人

民群众近期切身利益的倾向，有些人甚至用自己的主观意志代替人民群众的思想，随意地发指示、下命令。

这种错误倾向反映在无产阶级革命方面，就是不顾时机是否成熟，盲目发动暴力革命，急于夺取政权，而不愿意从现实条件出发，做艰苦细致的工作，组织、动员广大人民群众反对资本主义的剥削与压迫、维护自己的切身利益，并在这种斗争中积蓄壮大革命力量、为争取社会主义的胜利做好准备。结果，党逐渐脱离群众，在选举中的得票率、在社会政治生活中的支持率每况愈下，乃至游离出群众的视野变成政治小团体。在我国土地革命时期，由于错误方针的指导，红军离开根据地去进攻大城市，城市地下党组织冒险举行大规模的游行示威和武装起义，试图在短期内夺取全国政权，结果导致革命受挫，造成广大党员、红军战士和人民群众流血牺牲。这一问题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体现得更为突出。其主要表现是超越阶段、脱离现实、急躁冒进、急于求成，从根本上讲就是没有把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摆在应有的位置。例如，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从苏联到东欧，再到中国等亚洲人民民主国家，都是“全盘集体化”。其主观意愿无疑是希望通过集体化，避免两极分化和资本主义剥削，引导农民走上集体富裕的社会主义道路。但这种良好意愿一到具体实践过程中就普遍存在贪快求齐的问题，即片面追求集体化的速度和全国的整齐划一。在短短几年中，就实现了集体化，难免出现自上而下，摊派任务、强迫命令的现象。全盘集体化的结果又如何呢？首先，不仅没能促进农业生产力的提高和农业大发展，反而造成生产力的下降和农业的停滞，乃至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出现了大饥荒。苏联的全盘集体化不久就出现了 30 年代的大饥荒，直到斯大林 1953 年去世，其人均占有商品粮仍未超过旧沙皇统治下 1913 年的水平。中国在人民公社后就出现连续三年的困难时期，尽管反

复强调以粮为纲，尽管我国十亿人口八亿农民，但经过几十年的奋斗，粮食生产仍满足不了需要，人民的温饱问题仍未解决。到90年代中期，还有社会主义国家发生大饥荒，不得不求助于国际社会。其次，农民的生产、经营积极性不仅没有调动起来，反而受到挫伤。由于短期内大规模集体化，农民突然间脱离土地等生产资料，其收益与其付出的劳动也不相符，再加上缺乏必要的管理制度和经验，很快就出现干和不干一样、干多干少一样的平均主义、吃大饭锅现象，农民丧失了生产积极性和主动性，劳动生产率未能提高，农村长期处于贫困落后之中。与此形成对照的是，改革开放后，人还是那些人，地仍是那些地，只不过政策变化，取消了人民公社，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农民获得土地使用权，其生产与收益直接挂钩，大大提高了生产和经营积极性，粮食及其他农副产品产量连续增长，仅仅十多年的时间，大多数农村已解决温饱问题，逐渐富裕起来。这一方面证明了这一举措适合现阶段我国农村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受到农民拥护，另一方面也从反面告诉人们集体化本身虽然是必要的，但其具体做法和体制并不适合现阶段农村生产力发展和农民的实际需求。值得注意的是，全盘集体化主要是长官意志、行政命令，农民对此反应冷淡，顾虑重重，抵触情绪比较大。可惜当时的领导并未认真听取农民的呼声，采取相应的对策，保护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和切身利益，而是以自己的主观愿望代替农民的实际需求，不惜用间接乃至直接强迫的方式达到预定的目标，其教训值得我们永远牢记。又如，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目的和指导方针。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到底是为了什么？这个问题看似简单，但苏联及其他各国在进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时实际上长期没有很好解决。人们从长远的、抽象的含义理解较多，从近期的、具体的含义理解不够。人们常说经济建设为政治服务，生产的目的是建设社会主义，为实现

共产主义创造条件，但经济建设、生产和社会需求特别是普通百姓眼前生活需要之间的关系如何讲得较少。苏联进行了几十年社会主义建设，直到斯大林逝世前才承认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是满足社会需要。这样，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指导方针上就产生了几个偏向。一是重积累轻消费。国民收入的大部分用于扩大再生产，而直接用于改善民生、提高人民物质文化水平的投入相对较少。二是重工轻农，过分强调优先发展重工业、忽略轻工业。苏联长期忽视与人民物质生活密切相关的农业、轻工业的发展。改革开放前中国虽然强调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但农业、轻工业的投入还是太少。三是重计划轻市场。经济的发展，企业的生产，不认真考虑市场的情况，也就意味着没能很好考虑普通百姓的需要。与此相联系，社会主义各国长期不承认商品生产，价值规律，更谈不上市场理论，甚至把这些东西盲目看作资本主义特有的而加以抵制、批判，结果，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发展不平衡，产业部门的布局不合理，重工业，特别是国防工业发展快，钢铁、煤、电、石油等平均生产指标不断上升，而轻工业发展滞后，国民经济整体水平不高，平均国民收入、人均占有等综合指标与发达国家存在较大差距。生产与市场脱节，市场不急需乃至饱和的产品，仍按计划生产，造成库存增加和人、物、财力的极大浪费，而市场紧缺的产品则因未能及时列入计划，企业不能投入生产。人民群众的物质生活水平没有随着经济的发展、生产的增加而得到相应改善。一方面是长期的低工资制，造成相对的“国富民穷”的局面，人民无力改善自身生活状况。另一方面，市场供不应求，生活用品长期紧缺，粮、油、布等必需品不得不实行凭票供应。社会主义建设进行了几十年，人民在衣、食、住、行和生存环境等方面提高缓慢，与发达乃至新兴工业国家相比有较大差距，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没有充分体现出来。当然，国家的

经济基础和整体实力是制约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重要因素。例如，旧中国历史上就贫穷落后。但是，根本原因还是在于指导思想，没有把人民的近期切身利益放在应有的地位上。苏联是足以与美国争雄的超级大国，但人民的物质生活却达不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准，主要就是因为这个原因。苏东剧变的原因较多，但物质生活长期匮乏，同发达国家差距过大，造成人民不满和青年盲目崇拜西方生活方式，也是不容忽视的因素。

三、必须高度重视生产力的发展和科技革命， 抓住机遇，迎接挑战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教训之一是重视生产关系的变革，而忽视生产力的发展，即“穷过渡”和“急于过渡”。所谓“穷过渡”就是脱离本国具体国情，脱离本国生产力发展水平，企图单纯依靠抓阶级斗争、搞政治运动、变革生产资料所有制、提高生产资料所有制公有化程度，在生产力发展相当落后，在人民物质生活相当贫困、甚至理论问题尚未解决的条件下，凭直觉向共产主义过渡，以为只要生产关系变革搞好了，消灭了阶级和阶级差别就可以实现共产主义。为此，苏联在短期内迅速实现了工业全盘国有化、农业全盘集体化，我国也大搞人民公社化运动，提出“共产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是桥梁”的口号。所谓“急于过渡”，是指企图超越必经的阶级，一步跨入共产主义，在实际工作中，往往以人的主观意志代替客观规律，通过群众运动的方式进行社会主义建设。苏联赫鲁晓夫提出20年建成共产主义，勃列日涅夫宣布苏联已建成发达社会主义，中国提出10年到15年超英赶美，要跑步进入共产主义。无论是“穷过渡”还是“急于过渡”，都忽略了生产力发展水平和人民富裕程度这一重要标准。结果，社会主义改造已

经完成，国有化、集体化实现了，宣布要向共产主义迈进了，而生产力发展水平依然很低，广大人民群众的生活依然不富裕，甚至仍有不少人处于贫穷落后的状态。这既败坏了社会主义的声誉，也挫伤了广大人民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

科技是第一生产力，是促进经济发展的首要因素。自 70 年代以来，一场以微电子、信息技术为核心的新技术革命悄然兴起，信息技术、生物技术、新材料技术、新能源技术、海洋开发技术和空间技术迅速发展。美国在许多领域处于领先地位，日本、西欧奋起直追。但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则对这场新科技革命缺乏足够的思想认识，没有采取必要的对策和措施，从而在科技方面进一步拉大了同西方国家的距离。本来苏联的科研基础雄厚，并在某些领域居世界领先地位，也不乏世界一流的科学家和优秀技术人才，但其科技的发展缺乏系统性、实用性和先进性，特别是信息技术严重滞后，其根本原因首先是科技管理体制落后僵化不能适应新科技发展的需要。它的科学研究同生产脱节，发明创造同实际推广应用脱节。科学家的研究成果，除了军事技术，一般都很难及时投入生产，转化为生产力，即使有些研究成果能够大量生产，其周期也过长。本来可以领先世界的一项发明创造，可到实际投产时可能早就丧失了优势。其次，由于冷战，大量资金投入军备竞赛，科技投入无法大幅度提高，致使科研缺乏后劲，在需要高投入的信息技术领域落后于西方。中国在 50 年代中曾十分重视科技进步，但后来随着以阶级斗争为纲路线的确立，除了军事、核技术之外，整个发展都受到冷落和冲击。70 年代新科技革命日新月异，我国却发生了“文化大革命”，许多著名科学家和优秀科技人才遭受迫害，无法从事正常的科研工作，许多重要科研项目被迫停止，从而丧失了发展机遇。科技落后导致经济发展缓慢和综合国力下降，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和优势难